

世界文化丛书

A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中国的文化 和科学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

中国的文化 和科学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文化和科学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3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76 000

1988年10月第 一 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4 700

*

ISBN 7-213-00250-3/G·43 定 价：3.00 元

6/11/06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

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前 言

很久以来，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人们认为中国从未产生过能与西方文明相比拟的文化。因此，每当西方学者们一触及到中国社会传统思想时，总是强调儒家学说特有的伦理准则以及与此相应的儒家理想社会的类型。另一方面，中国的理论家们则将这个问题归咎于一个剥削性质的社会经济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人们通常称之为“封建主义”。他们特别注重权势和土地的所有制。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了解中国早期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中国所曾经向往的“西方化”，也同某些国家所经历过的一样，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技术。

但是，中国要完善和扩大她的成就，是不是一定要或者是一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呢？西方文明又是不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准则和标准呢？这是一个引起许多人关心的论题。事实并非象一些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说中国人发明火药只是用来制造爆竹，发明高精度指南针也仅仅是供几何学者们玩玩而已。这些发明后来有的被使用于侵略和破坏，于是更加引起了争议。现在有些研究古代中国的西方学者已注意到这一争议，而且又一次地看到了曾为人们遗

忘了的西方科学传统又在中国重新萌发。

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之所以缓慢，看来其原因还在于传统的官僚机构，一千多年以来，它一直起着消极的和压制科学技术的作用。从参加本书创作的当代科学家们的讨论中，人们仍可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惰性的痕迹。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本著作的巨大历史价值，同时它也是一本非常引人入胜和适合时代的著作。

关于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有多少贡献，中国社会的哪些特征造成了对中国工业革命的阻碍，以及为什么在西方曾利用这些发明促进他们的工业发展等等问题，依我看，本书已经作了解答。我相信这是一本很有用的书，用一句中国俗语来说，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中国当今的历程不是独一无二的，所有想通过采用现代西方形式的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从而跻身于新的国际行列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至于如何减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困，乃是政治家和普通公民所共同关心之事。基于这种远见，约翰·默逊组织了这本资料丰富的学术报告，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肯定，它不仅将引起专家们的巨大兴趣，也会博得广大读者的爱戴。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田汝康

于堪培拉

1981.8

译者的话

约翰·默逊是澳大利亚的著名记者。他为了向全世界正确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特点，走访了世界各地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采访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请他们谈谈对中国文化科学发展特点的看法，然后，编辑成这本书。澳大利亚的电台曾经广播了本书的内容，在国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读全书，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反思”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颇有启迪。正如我们中国人所喜欢使用的一句成语：“旁观者清”，书中许多国外著名专家学者的见解，是他们经过多年深入研究以后形成的独到见解，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有些看法与意见，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有点隔靴搔痒，并未触及事物的实质或要害；其中亦有某些明显错误的见解，例如，第七章中弥尔顿认为中国“存在有两个共产党”的说法，当然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本意，当然并不是希望读者全盘接受书中的观点，或者完全同意所有专家学者的所有看法，我们的原意，只是为了解这些看法与意见有助于我们思索，有助

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今日的中国，我们面临着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建设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谁都会回答说：扬弃糟粕，保存精华，那么哪些是精华呢？哪些又是糟粕呢？我们认为多多听取各种各类的意见，然后，反复思考，反复研究，才能有助于得出某种比较正确的结论。

全书十二章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谈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所谓的“传统”，编者的意思显然是笼统地指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化。第二部分谈二十世纪时期的中国文化，在后一部分，编者采录了许多中国学者、干部、普通工农的谈话，这些谈话并未经过谈话人本人的审核，再加上经过来回的翻译，也许同本意有所出入，这是要请谈话人谅解的。同时也要请读者阅读本书时牢记：我们翻译这本书的原意仅仅是“启发我们自己的思索”，正确的结论还得由我们自己去下。

书中涉及的中国人的名字也因为几经翻译，或许已非原字。我们不可能一一核对、查考，多数人名只能采用音译的办法，尚希谅解。

中国有辉煌灿烂的文化历史遗产，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翻译涉及这一主题的书籍实非易事。加之我们才疏学浅，译注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请读者多多指正。

余旭，余甦，陈锡标，谭伯杰等同志在翻译过程中，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庄锡昌

1987.7

目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1)
前言 田汝康	(1)
译者的话 庄锡昌	(1)
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一章 哲学和社会	(3)
第二章 科学的理论和实践	(22)
第三章 经济和技术	(43)
第四章 西方的影响	(62)
二十世纪的中国	
第五章 从革命到解放	(85)
第六章 苏联模式和大跃进	(104)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红与专	(123)
第八章 毛泽东和四个现代化	(143)
第九章 农业与环境	(161)
第十章 学术研究、心理学和社会科学	(181)
第十一章 知识分子的自由、个人与法律	(202)
第十二章 经济学、工业和贸易	(222)
编后记	(244)

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一章 哲学和社会

默逊：这一部分将探讨构成中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随后，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某些独特之处，以及它们对我们欧洲文化和欧洲历史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国竟然要从西方寻求现代科学和工业技术，这真是颇为可笑的事情，因为在16世纪之前，情况正好完全相反。现代科学的预言家之一弗朗西斯·培根，他在17世纪所写的著作中，列举了一连串他认为对改变欧洲面貌起作用的科学和经济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技术，其中有火药、指南针、钟、纸和印刷术，以及欧洲的造船者和航海家的技艺等。我们知道，这些特殊的技术都发端于中国。从罗马时代起，直到16世纪欧洲人找到通往东方的海上航路为止，这些技术是和丝绸、瓷器、甚至面条一起经由阿拉伯、土耳其和拉丁商人而传入欧洲的。

使人们感兴趣的是技术在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的活动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常常是无可预测的。

就欧洲来说，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和人工制品在那里的影响通常远比在中国本地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同样的技术，经历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改造之后，19世纪重又在中国出现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枪炮和文化终止了中

华帝国的文化主权。这个帝国延续2000余年了，直到13世纪为止，她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有着世界上最丰饶的农业，潜藏着激发经济革命——类似欧洲18世纪发生的那种经济革命的足够的科学和技术。但是，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中国并没有起飞。中国为什么没有象西方那样发展，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后会经常回到这一个问题上来。首先还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某些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机构和哲学。

为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访问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心。在剑桥大学，我拜访了东方研究学院的麦克·罗伊博士，请他解释一下同西方封建社会相比，为什么中华帝国延续特别长久和异常稳定的原因。

罗伊：我想首先从比较开始。东方各帝国王朝明显是成功的，经历时间也是很长的，而在西方，我指的是欧洲，你无法提出一个同样的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你可以提到神圣的罗马帝国，但从政治上和朝代更迭方面来看，它确实比不过东方帝国。我十分肯定，这种差异发端于中国社会发展初期就形成的基本的生活观念和人的组织观念。你可以注意到两种基本的哲学：通常为人所熟知的道家和儒家哲学。道家认为自然是存在的中心，人的目的是使自己同自然（过程和节奏）相协调。儒家的世界观是把人看成为存在的中心，认为人的责任和骄傲就在于组织集体性的劳动和改善集体性活动，使它为整个人类谋利益。中华帝国政府依赖于这两种类型的哲学。这两种哲学以中国所特有的方式成功地协调在一起了。

默逊：你能够给我举一个例子吗？

罗伊：我想你可以这样看问题：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整体。

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联合的系统内，伦理价值、物质世界的活动、自然演化的过程、政治形式和组织、人类命运以及王朝的兴衰，都遵循着同样的一套原则，都遵守同样的宇宙观。

默逊：你现在所作的比较是，认为欧洲人倾向于把精神和物质分开。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倾向于建立一个超经验的学术系统，这个学术系统涉及到精神和物质世界以及与形形色色的各种规律相联在一起的各种现象。中国人似乎把精神和物质这两者统一在一种系统中。在这样的系统中，比之于西方人，他们更易于把一切联系起来。

罗伊：我想确实如此。中国希图建立一个哲学系统，人们的政治秩序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认为在西方始终有一种分离教会和政府的趋向，而在中国，人们一贯倾向于把两者统一起来。例如，你可以发现中国从很早的时期起就有一种叫做天命论的理论，这种理论把暂时（人间）的权力和永恒（天上）的权力结合起来，或者说力求把它们结合起来。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出现“王权神授”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最初在西方出现时，是一种分裂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团结的力量，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力，反对教皇的权力。很久以后，才被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接过去为他们自己的特定目的服务。

默逊：刚才所说的中西方哲学倾向的不同，显然很明白，不是由于中国人某种思想的偏差，而是有其充分的经济原因的。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在一种世界上最复杂、最成功的农业经济的前提下出现的，它所供养的人口远比欧洲所供养的人口为多。这是我访问巴黎大学琼·茨诺克斯教授后得出的观点。

茨诺克斯：中国的哲学传统有某种独特性，但是，这种哲学传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我倒宁愿强调，现代化之前的中国

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形成它的哲学传统一个主要方面的原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将从问题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开始研究。将来不过是过去的延续，现在的任务是使得将来和过去衔接起来。在中国这既是国家也是家庭所共负的最高职责，是有学问的学者和平凡的农民所共负的职责。显然这是农业社会的合乎逻辑的事。农民的生活同样的有赖于处理好这种将来、现在和过去的关系。农民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使其将来同过去相一致。在农村，农民反复地经历着同样一种活动日程，如照料牲畜，开门——每天如此的重复着；收获季节和耕耘季节——每年这样重复着。中国人懂得历史的局限性，我把它称之为他们对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插曲的认识，他们全部的观念基于某种假设，认为人类最重要的职责，尤其是那些对人类的未来负有责任的人物的职责，是检验未来是否是过去的重复。这也是各行各业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的想法。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通常帝国选择官吏的考试科目也是这些，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同一个人既能做一个优秀的将军，又能成为一个能干的财政官员、一位法官，或者是一个县的督学，或者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吏。如果你了解过去，你就能领导将来。这是人类进化的循环论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它是哲学的，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哲学的方法。但是，这种哲学方法直接把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置于优先地位。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华帝国毕竟是几千年前建立的，而在同一个时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已湮没在沙漠之中了。相对而言，中华帝国是稳固的，至今屹立于世，从太古一直运转到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

默逊：农业生产在一年里不断地要求人们从事各种劳作，